

迷思與反思： 從學位論文到專書的出版經驗

劉紹華*

2010年底我在史丹佛大學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的專書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出版後，不少學界友人除了恭喜我外，也會以帶著些許遺憾的口吻說：「唉！以前我們都被告知不要寫專書，因為升等不算數，要寫期刊論文，所以論文就一直擱著沒有處理。現在要做會不會太晚了？」我也還記得2007年我甫進入中研院工作時，遇到一位多年不見的學界老友劈頭就問我來中研院工作的計畫，我毫不猶豫地回說：「我想寫書……。」不等我說完，他便笑笑地說：「很多人都這樣說過，但後來都不了了之。」這些回應值得深思，但我覺得有些是迷思。

當前學界的出版壓力無需贅言。出版專書的三年間，我飽受各種壓力。但回顧其中的經歷，這些壓力也讓我有些反省。關於出版專書時需要注意的一些知識與技術面向，過去在《簡訊》中已有藍佩嘉與黃倩玉兩位學者寫出精彩分享¹，許多過程與注意事項可以參考前文。在本文中我主要是分享將博士論文改寫成專書一路走來的個人心路歷程。

先談出版動機。每位想寫專書的學者，都有做這件事的學術理由。至於何時開始寫、何時完成等時間規劃，可能按照個人學術生涯情境做調整。我還多了一個理由，讓我自覺「必須」要快一點做這件事，拖不得。最根本的原因是基於我的「研究倫理」。

從我的專書書名可以看出，我處理的是當代中國極為敏感的毒品與愛滋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¹ 藍佩嘉，〈一段漫長的旅程：談專書出版經驗〉，十卷三期；黃倩玉，〈一段更漫長的旅程：也談專書出版經驗〉，十卷四期。



病議題。這是個變化迅速的社會問題，而且，我的報導人「走」得很快。所以不論是基於我對個別報導人的義務，或是期待自己的研究可能產生的社會貢獻，都讓我覺得研究及時出版是我對當地人的責任。我期望以英文出版能讓國際學者與組織了解這些議題，進而透過國際的力量影響中國的政策實作。而出版中文書則是直接與在地讀者對話，期待另一種可能的發展方向。

我的出版動機很早就已浮現，所以當我寫博士論文時，便不自覺地往這個方向寫。記得當我把論文初稿面交給老師時，她問我：「你是寫得像論文，還是像書？」我從沒想過這個問題，愣了一下才回說：「像書。」

我後來才知道，兩者之間有關鍵差異。有心將博士論文改寫出版的朋友可以仔細想想這個問題。我看過一些教人如何出版的工具書，都會提到這個關鍵問題。感謝當年那位老師一針見血的提問，讓我很早就開始思考其中的差異。

前人的出書經驗也是很重要的啓蒙。一些前輩、友人都告訴我，寫完論文後，「最好等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再回頭看」。畢業半年後正當我開始思考何時要重閱自己的論文時，因緣際會遇到一位剛拿到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正式出版契約的美國學者，便開始了我從 2007 年底到 2010 年底緊鑼密鼓的出版過程。我才知道事情繁瑣的程度絕非「出版」二字可以化約。以下大致是三年間的準備過程。

2007 年底我赴美參加美國人類學年會前幾天，前述的美國學者建議我先和幾家大學出版社的徵稿編輯（acquisition editor）聯絡。至於如何選擇出版社？參考前人經驗，我就回想最有印象的書是那些出版社出的。如此，我先選了五家出版社，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史丹佛大學出版社、杜克大學出版社、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及加州大學出版社。值得一提的是，我當時是想學習專業，抱著不接觸就不會瞭解的心情，所以一開始就鎖定這幾個亞洲研究領域裡大型且優良的出版社。

接下來的第一步是寫信跟徵稿編輯聯絡，以期能在年會書展時有機會向他們自我介紹。我還記得坐在電腦前花了兩、三個小時就只爲了寫一封三言兩語的信。這些編輯每天不知收到多少信件，要讓他們在茫茫信海中看到我的自薦信還願意回應，我想非得要精簡有力吸引人才行。

我投石問路的第一步運氣不錯。四間出版社隔天都回信了。其中杜克大學出版社最爲熱絡，編輯和我約了喝咖啡。史丹佛大學出版社和哥倫比亞大

學出版社也很友善，約我到書攤碰面。康乃爾大學出版社說歡迎拜訪他們的書攤。只有一間沒有下文。高達五分之四的回信率讓我突然覺得像是「玩真的」。我便開始慎重其事地考慮跟編輯碰面時要說甚麼。

於是趕快跟友人前輩借了他們當初遞交給出版社的計劃書（prospectus）參考。爲了完成自己的計劃書，我覺得好像又重新經歷了一次論文寫作過程，絞盡腦汁。但過程頗有收穫，似乎更了解自己到底寫了甚麼、沒寫甚麼。在修改計劃書的過程中，我想起以前老師苦口婆心的提醒：「如果你不能用一句話說明你的研究內容與意義，那表示你還不太了解你自己的研究。」於是，我花了相當時間撰寫計劃書的第一段，尤其是第一句話。終於，我帶著僅有兩頁濃縮精華的計劃書去開會了。

去書展會場尋找編輯也是一場試煉。走入人山人海的會場，懷裡揣著計劃書，頓時信心大失，但也只能硬著頭皮上場。想想看那個畫面：當你在跟編輯自我推銷時，旁邊可能就潛伏著幾隻菜鳥在觀摩，外加好事老鳥訕笑回顧當年。很感謝我所接觸到的編輯，他們可能看慣了像我這般菜鳥盡力毛遂自薦時的生疏與心虛，都表現出高度的善意與同理心。一般來說，在美國學術界年會參展的出版社編輯都是關鍵人物，他們都隨時等待潛在作者前來探訪。這和臺灣書展都是派工讀生顧攤位完全不一樣。所以我除了拜訪約定的編輯外，也參觀了一些原先沒有聯繫的出版社，就當作是「了解市場」。

有人認爲要準備好書稿才去接觸出版社，也有人認爲可以先行接觸。兩種成功經驗我都聽聞過。幸運的是，有三家出版社一談完就明確表示有興趣看我的書稿，直接問我：「你甚麼時候可以給我書稿？」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甚至說：「我們一般不看博士論文，但我可以看你的論文。不過如果你可以修改後再寄給我更好。」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我完全沒有預期這麼快就可以進入下一步。

從書展會場出來，師長朋友都要我「把握機會」，趕快修改論文。因爲拖下去可能會有變數。例如，「換了一個編輯說不定就不認前人的口頭承諾」、「拖太久編輯忘記你了就失去興趣」等。此外，大家都說，我必須做選擇，因爲通常一次只能將書稿送給一家出版社審查，除非其他家出版社願意同時審查。

選擇是一門藝術，關鍵是了解自己和別人的風格。在三家表現熟絡的出版社當中，最積極的是杜克大學出版社，編輯花最多時間跟我交談修改意



見，我也就有機會近距離了解這家出版社的風格。這家出版社真的很不錯，而且近年在美國學術書籍的市場上聲勢頗大。不過，我當時覺得它的人類學系列近似某類型的文化研究風格；編輯的建議雖然專業，但也有點「聳動」、「戲劇化」的傾向。就市場而言，我很明白這是好意見，問題在於個人如何定位自我研究議題的風格。我掙扎了許久，想到我處理的議題有其特性，要以信手捻來的生花妙筆風格來寫攸關人命、苦痛的故事，我的內力還不夠。我自覺若爲了「高攀」而改變風格，最終一定會因拗不過內在極其個人性的「倫理掙扎」而痛苦。我「務實」地放棄了這家優良出版社。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最後則選定史丹佛大學出版社。

去年會書展過水一趟回臺後，投注了半年的時間把論文改成書稿，幾乎都沒有週末了。大幅修改的程度讓我覺得好像又寫了一次論文。值得一提的是，在修改過程中我不斷問自己，「寫這個 who cares?」，大刀闊斧的結果是我幾乎刪掉了原文一百頁。2008年6月我寫完初稿後，準備與出版社聯繫時，才突然想到頁數的問題。困惑之下撥了通電話給藍佩嘉教授，請教她當時交出的書稿頁數。一聊之下，才發覺自己的書出版時可能不到兩百頁呢！平常我並不愛寫長文，但此時也不禁自我懷疑：「大家常常以書寫的厚度來表示學問，那我的書不夠厚，怎麼辦？」善良的藍佩嘉立刻替我施打強心針：「寫多很容易，寫少比較難。書太厚學生不愛讀、也不想買，老師就不會指定成教科書啦！」我很高興地接受她的安慰。沒錯，我的初衷也是希望自己的書成爲教科書。以前當學生時要讀修課指定書籍前都會先看頁數，書太厚的作者都會被我小小詛咒一番。後來我知道一些美國、香港的教授上課指定我的書爲教材，我想厚度適中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同時，我也申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WEAI）的叢書系列。美國有些大學的區域研究中心都有自己的叢書系列。有些是自行出版（如哈佛大學亞洲中心），有些則是和其他出版社合作，不發行只整合與推廣叢書系列（如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WEAI 叢書系列過去收入的多是知名學者的重要作品，總是項榮譽，我想試試看無妨。初出茅廬的好處就是還沒嘗過太多被拒絕的滋味，不致因苦澀而忌憚嘗試。幸運的是，經過兩個機構各自的審查過程後，我的書由史丹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同時列入 WEAI 叢書系列。雙方都有各自的行銷推廣渠道。

順帶一提，史丹佛大學出版社最初表示有興趣看我的書稿時曾問我是否

要簽訂有條件的契約 (conditional contract)。但當我知道這個合約只表示對方會審查書稿，並不表示最後一定會出版時，我只覺得有點自欺欺人、多此一舉的意味。不過，也有人笑我太傻，說一紙契約在手，不管內容如何，都比較安心。這是見仁見智的後話了。

2009年3月WEAI與史丹佛大學出版社的三份審查都完成了。所幸我收到的所有意見都極為正面，互不衝突。在忙碌的工作中我又努力擠出時間修改，主要是回應審查人的補充建議，並因應不斷變動的訊息以調整書寫。2009年9月我將再度修改過的書稿寄回，並附上回應審查意見的修改說明。這個過程就像第三度撰寫論文，我得不斷提醒自己要耐著性子。之後才算真正開始進入一連串令人眼花撩亂的出版過程。

首先是出版社的董事會要開會以正式決定是否要出版我的書。記得徵稿編輯很慎重地告訴我，要我好好填寫一些問卷表格以利董事會決議。最後董事會決定同時出版精裝與平裝本，這表示他們覺得我的書有市場。這對我而言真是個好消息，至少以後我要送書時，還買得起平裝版送人。

史丹佛大學出版社的編輯極為專業，令我驚艷與佩服。記憶中同時至少有三名編輯與我聯繫，最初的徵稿編輯總管我的案子並負責封面設計事宜，另外還有一名負責簽約與行銷推廣的編輯，以及一名統整文字編輯作業 (copyediting) 的編輯。這幾名編輯在不同階段與需求時分別與我聯繫，合作無間，讓我極為佩服他們在專業分工與整合上的穩定成熟。和這家出版社合作也是我目前遇過最好的文字編輯經驗，令我收穫良多，而且編修費用由出版社負擔。有些出版社要求作者自付文字編修費用，家家的政策可能有所不同。

之前許多學者都表示索引 (index) 最好是自己做，但因為時間緊湊，加上出版社建議找專業人士做，並估算出我需要負擔的索引費用約為美金八百至一千元，我便決定委託出版社。不過，後來我也花了一番功夫修改索引。即便如此，我覺得找專業人士做好後自己再修改，還是比我獨力完成要好。

經過了來回多次的校對檢查等傷眼功夫，2010年5月我終於交出了無可逆轉的定稿，同時還填寫非常多包括行銷問卷等的繁複表格。如果書中部分內容我曾在別處出版，還得取得該出版處的授權書。此外，由於我們選定製作封面的照片，是早年我以畫素不高的相機拍攝而成，所以出版社也費了一番功夫幫忙處理照片。終於，2010年10月初我收到了一本熱騰騰的從印刷



廠寄給我的書。大功告成。

出書是要付出代價的，緊鑼密鼓地工作要付出更多代價。整個過程馬不停蹄，疲累是最直接的感受。記得我剛投入出版計劃時，一位資深學者跟我說，她校對完新書樣稿後，眼睛都壞了。果真，在過程中我換了一副眼鏡。另外的壓力就是密集改寫論文像是一場賭博，結局難測。把時間的賭注都先押到專書，也就表示那段期間沒法寫期刊論文。另外，我也忍受了2008年一整年只有一篇書評刊登出來的窘況。

所幸我並沒有被「寫書就不能寫論文」的零和迷思絆住，這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 Myron Cohen 非常建設性的鼓勵。他說：「趁現在你其實還不是太忙的時候趕快做這件事，不然以後你只會更忙，更沒時間做。書稿交出去後要等好一段時間才会有回應，這時你就可以做別的事。」當我把初稿交出去審查後，我就開始寫期刊與專書論文。而且發現專書寫作讓我得以對自己的研究有更全面性的掌握，此時將議題切割細談或衍生討論反而游刃有餘。所以專書出版的三年間，我就在修訂書稿與撰寫單篇論文之中來回交錯。看起來，我的收穫反而比先寫期刊論文再寫專書來得豐富。

在專書出版前後，我開始發現周遭的氣氛似乎正在轉變。國科會專書寫作計劃的獎助條件比起我申請時優惠許多。「專書的壽命比期刊論文長」、「專書的影響力比較大」、「專書才能真的代表學術成果」等等說法似乎也比之前容易聽聞。周遭一些同儕也開始有興趣撰寫英文專書。以往那股「打擊專書寫作」的迷霧似乎逐漸散去，年輕學者應該得以更為開放的思考自己為什麼要把學位論文改寫成專書，以及如何開展這段旅程。